

# 從中原到敦煌

## 《秦婦吟》傳播原委新探

田衛衛

作為唐代篇幅最長的敘事詩，《秦婦吟》享有繼“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長恨歌》之後，為唐代敘事詩樹起了第三座豐碑”<sup>1</sup>的盛譽。但是，據孫光憲（901-968）《北夢瑣言》記載：“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而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緋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sup>2</sup>這首曾經在唐末家家制為緋子的名詩，卻在問世後百年左右即失傳於世間，並消失蹤影約千年之久，直到敦煌藏經洞文獻被發現，才得以再次面世。可以說，正是借助於《秦婦吟》自中原向敦煌的流傳，其詩文內容才能為今人所知。那麼，《秦婦吟》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通過怎樣的途徑傳播到敦煌的？本文即從此角度出發，嘗試分析《秦婦吟》文本從中原到敦煌的傳播問題。

### 一、傳播的政治背景 沙州歸義軍與唐朝的關係

《秦婦吟》在中原的流行與消失，與當時當地當權者的態度有著非常大的關聯<sup>3</sup>。那麼，《秦婦吟》在從中原到敦煌，以及在敦煌地區傳播時，是否也受到了這種因素的影響？為論述這一問題，首先交代一下《秦婦吟》從興起中原到風行敦煌的具體年代。

#### （一）《秦婦吟》從興起中原到風行敦煌的具體年代

根據詩文內容可知，《秦婦吟》創作於唐僖宗中和三年，也就是西元883年<sup>4</sup>。至於其在中原失傳的時間，應在十世紀中晚期，這一點可以根據孫光憲《北夢瑣言》對

<sup>1</sup>周嘯天主編《唐詩鑒賞辭典補編》，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年，68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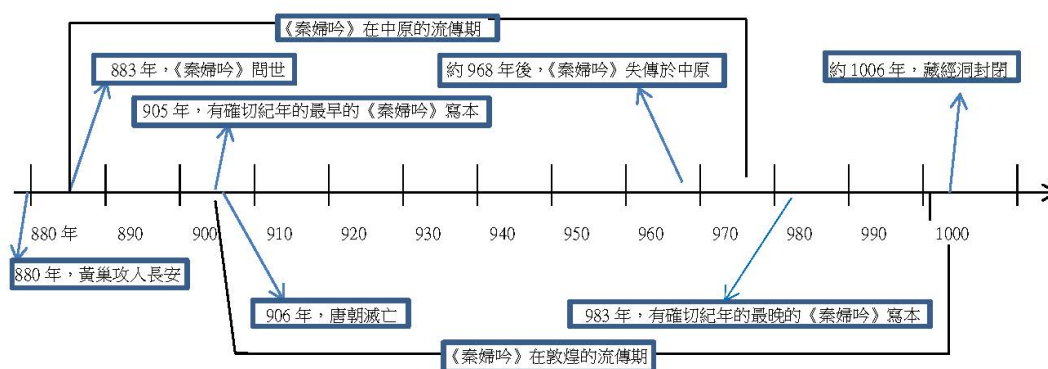
<sup>2</sup> [五代]孫光憲著、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中華書局，2002年，134頁。

<sup>3</sup>參拙文《秦婦吟 中原傳播興衰新探》，《唐研究》第20卷，待刊。

<sup>4</sup>詩歌首句“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點明時間為僖宗中和三年癸卯歲（883）；結尾處有“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風景異”；“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王國維推斷此詩為

韋莊禁懸《秦婦吟》緝子止謗，卻“亦無及也”，以及宋人以下記載均承襲孫光憲說法這一事實而得以確認<sup>5</sup>。由此可知，《秦婦吟》在中原地區的存在與流傳不過是883年問世之後百年左右的時間。

關於《秦婦吟》在敦煌的流傳情況，雖然沒有確切的材料可以說明，但是根據已經發現的寫本，或可以大體推測。目前，共計發現十一件《秦婦吟》寫本，其中有七件帶有確定或可以推測紀年的文字：P.3381（905年）\ S.0692+羽57R（919年）\ S.5834+P.2700（920年）\ Dx.6176（946年）\ P.3780（957年）\ P.3910（979年）\ Dx.4758+Dx.10740（約963—1006年）。最早的抄本是天復五年（905），此本是一位在敦煌金光明寺做學仕郎、名叫張龜的學子所抄錄。因此可以推測，張龜習書時所照抄的母本定然時間更早。如若根據目前學界推測藏經洞封閉於十一世紀初年的說法來判斷的話，那麼《秦婦吟》一詩在敦煌的流傳時間至少應該是從905年之前直到十一世紀初年約百餘年的時間段之間。前文已經提到過，《秦婦吟》在中原的流傳時間大約是883年到十世紀中晚期，兩者對比可知，《秦婦吟》在長安、敦煌兩地的傳播是十分迅速的。為了視覺效果的直觀，於時間軸上簡單標注《秦婦吟》自產生以來的傳播情形如下：



若要探討《秦婦吟》傳入敦煌的具體時間，則理清883—905年敦煌與中原之間的來往情況極為重要。而要討論這一時期中原與敦煌的交往交通，則歸義軍的興起及其與中原之間的關係亦需交代。本節筆者擬從這個角度出發，對《秦婦吟》傳播至敦煌的背景稍作分析與解說。

韋莊自長安經洛陽前往江南時獻給周寶的幹謁之作（見氏著《韋莊 秦婦吟 又跋》，《觀堂集林》卷二一，中華書局，1924年，1019頁）；且詩歌中涉及之黃巢攻入長安、唐軍與黃巢軍反復爭奪長安、官軍屯於洛陽城外等史事均發生於883年之前，再聯繫韋莊之生平年譜（夏承燾《韋端己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可知此詩確為韋莊南下幹謁周寶而作。王國維、夏承燾等皆持此意見。

<sup>5</sup>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與《秦婦吟》相關的十餘種傳世文獻記載的內容基本都如出一轍，都是謄抄、繼承了孫光憲的說法。見拙文《秦婦吟 中原傳播興衰新探》。

## (二)《秦婦吟》傳播至敦煌的背景

### 1、唐廷方面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沙州地區爆發了驅逐吐蕃統治者的軍事反抗。以漢族為主的僧俗民衆在當地豪強張議潮的率領之下,連戰連捷,驅逐了因為贊臙遇刺身亡、奴部紛紛起義而勢力大衰的吐蕃統治者,先後佔領了沙、瓜二州。在初步取得勝利後,張議潮遣押衙高進達等取道天德軍(今內蒙古烏梁素海東南緣)上表唐廷,報告歸復。與此同時,繼續修治兵甲,陸續收復肅州、甘州、伊州等地。隨後,再於大中五年八月派遣其兄長張議潭攜瓜、沙、伊、西、甘、肅、蘭、畚、河、岷、廓等十一州的地圖、戶籍奉獻給朝廷,唐廷則在同年十一月賜號張議潮所部軍事力量為“歸義軍”,並授予張議潮歸義軍節度使等職銜。咸通二年(861),張議潮攻下了控制河隴地區最為關鍵的涼州,可以說基本完成了收復河西的大業。咸通八年(867),張議潮奉召入京,其結張淮深主持歸義軍軍政事務,議潮最終卒於長安宣陽坊私第,終年74歲。

接替張議潮執掌歸義軍的是張議潮之姪、張議潭之子張淮深,其統治時期在867-890年之間。在這約23年的時間裡,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長安,或向朝廷賀正,或向朝廷求賜節度使旌節,唐廷也數次封賞張淮深,拜張淮深為將軍,並加授御史中丞等職,但就是遲遲不予旌節<sup>6</sup>。此後的張懷鼎、索勳均掌權時間較短,沒有太多資料可列,但歸義軍第五任節度使張承奉統帥歸義軍十餘年,曾多次與唐廷交往,其後的歷代曹氏歸義軍政權與五代、宋諸政權亦皆如此<sup>7</sup>。

總之,在歸義軍統治時期,尤其在張議潮、張淮深統治時期,歸義軍方面主動回歸朝廷,數次遣使入奏,進獻圖籍,都表現出了耿耿忠心的臣子形象,歷來廣受史家稱讚;唐廷數次遣使往封、賜賞,也不能不令後來不少的臣子們敬慕與嚮往。但是,這樣一幅君賢臣忠的形象最終隨著敦煌文獻的出現而徹底逆轉。在敦煌文書的提示之下,再返回來看中原王朝傳承的史料,縱觀歸義軍政權成立以來的雙方關係史,則可知自歸義軍政權初建伊始,歸義軍與中央唐廷之間就是利益紛爭、貌合神離的狀態<sup>8</sup>。據《資治通鑒》卷二五〇載:

〔咸通四年正月,〕上(唐懿宗)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sup>9</sup>

<sup>6</sup>詳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78-88頁。

<sup>7</sup>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第二、三、四、六章內容。

<sup>8</sup>對此問題的分析可詳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第三、四章。

<sup>9</sup>〔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鑒》卷二五〇,中華書局,1956年,8103頁。

這說明早在 863 年之前，唐廷即已經開始在加固涼州城，而張議潮率軍從吐蕃的手中將涼州奪回，也不過是咸通二年之事，可見唐廷對獲得涼州控制權的急切<sup>10</sup>。

而唐憲宗時宰相裴度之第三子裴識墓誌的出土，更加明確無誤的昭示了這一關係。據《唐故給寧慶等州節度管內觀察營田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 公食邑三千戶襲食實封一百五十戶贈司空河東裴公墓誌銘》記載：

天子以河西新收，西涼府以歸，帥張議潮欲強盛邊事，擇其人（下缺）。<sup>11</sup>

裴識這篇墓誌是出自其屬下、給寧節度副使之手，可信度自然不弱，也因此將中原對歸義軍政權的戒心昭然以示。裴識本人生前曾先後任涇原、忠武、天平、靈武、給寧等鎮節度使，於咸通五年四月九日死於慶州。而此墓誌文中提到的西涼府，即當時的涼州地區，正是控制河隴的關鍵所在，所以唐廷與歸義軍對涼州控制權的爭奪也就明確顯示出了雙邊關係的實質。在這樣直言不諱的背後，赤裸裸的喻示著雙方關係的不和諧。實際上，唐廷也並不僅限於給寧節度副使這樣個別官吏發出空言，在此之前，唐中央政府還曾派遣精兵往駐涼州。來自夔州天平軍的兩千五百人在前往涼州戍衛之後，一直也沒有返回中原<sup>12</sup>。再結合涼州節度設置初期未見唐廷派遣涼州節度使的情況來看，很可能唐廷有意讓裴識以朔方節度使兼領涼州節度（五代初期中原政權多有以朔方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的事實）<sup>13</sup>，這批兩千五百人的部隊實際上就是唐廷支援裴識的軍事力量。除此之外，朝廷三番五次催促張議潮入朝為質、以及遲遲不予張淮深節度使節鉞等表現，都是二者之間存在矛盾的例證。所以應該說，對統治權的爭奪，貫穿唐廷與張氏歸義軍政權交往的始終。

雖然一方面唐廷急於取得涼州控制權，甚至進一步全面恢復對甘、涼、瓜、沙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實力不夠的唐廷，也不能不對張議潮進行籠絡，例如賜歸義軍封號，拜張議潮為節度使，並在派遣夔州天平軍軍隊進入涼州之時假以幫助張議潮鎮戍的名義，等等。

## 2、歸義軍方面

與此同時，面對唐廷這些隱性的奪權手段和策略，歸義軍方面也有不甘示弱的一面。雖然張議潭、張議潮不得不先後入朝為質，但歸義軍的最高領導者卻始終不曾由中央派遣。張議潮本人在前往長安的臨行之際，安排其絃子、張議潭之子張淮

<sup>10</sup>詳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相關章節。

<sup>11</sup>榮新江《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 書評》，《唐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559 頁。墓誌圖版見中國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一，北京文物出版社，第 374 號，361 頁。

<sup>12</sup>作為這批鎮兵直到最後也沒有撤回中原的證明，有五代唐明宗時期記載可證，見《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錄》吐蕃條。

<sup>13</sup>見李軍《晚唐（公元 861—907）涼州相關問題考察》，《中國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77—90 頁。

深繼續率領歸義軍。張議潮的親身入朝為質，對歸義軍的力量是很大的打擊<sup>14</sup>，唐廷終於如願取得了涼州控制權。證據之一，就是張議潮派親信回沙州迎接家眷前往長安一事的不能順利進行。P.3281v《押衙馬通達狀稿》稱：

付案過狀，押衙馬通達。右通達自小伏事司空，微薄文字並是司空教視獎訓，及賜言誓。先隨司空到京，遣來涼州，卻送家累。擬欲入京，便被盧尚書隔勒不放。盧尚書死後，擬隨慕容神護入京，又被涼州鞠中丞約勒不達<sup>15</sup>。

由此可見當時唐廷在與歸義軍的暗爭中佔據上風之後對待歸義軍的排斥與打壓<sup>16</sup>。但是，唐中央政府在這裡的統治並不穩定，崛起的癥末勢力不久便控制了涼州。在此情況下，身在長安的張議潮稱不欲“紿安爵位”，積極上書請戰，甚至表示“死亦甘心”，但唐廷卻借口糧料短缺等理由予以拒絕<sup>17</sup>。《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並批答》這件文書表明，張議潮在表白忠心、憂慮邊民國家疾苦的同時，也有返回涼州、統帥舊部之意，而唐廷的拒絕想必也有杜絕張議潮回歸的考慮在內，可以看做又一場沒有展開的權力爭奪較量。而作為歸義軍的反擊事例之一，就是歸義軍的再次收復涼州<sup>18</sup>。雖然唐廷已經對張議潮上表事進行了批答，並且此批答也隨同張議潮的上表一起在敦煌流傳，想來當時張淮深沒有理由不知道唐廷的處理意見，但是他仍然很快出兵，並率領歸義軍再次收復了涼州，並且直到張淮深統治後期，歸義軍都控制著涼州<sup>19</sup>。

前文也已經論述過，《秦婦吟》是問世於883年，即張淮深統治時期。根據學者的考證可知，當時的歸義軍與中原互相之間皆非同心同德，對此情況有頗多史料可資證明。比如，“在張議潮入朝後，唐朝並未馬上把節度使的職位給予淮深，碑文（張淮深德政碑）所說咸通八年後不久就充河西節度，顯然是淮深在境內的自稱”<sup>20</sup>。張

<sup>14</sup>楊寶玉、吳麗娛《張議潮束身歸闕後與沙州人士的往來及其對敦煌政局的影響——以P.3730v、S.6405v為中心，兼及P.3281v、S.2589》，劉進寶、高田時雄編《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31-342頁。

<sup>15</sup>文中的司空指張議潮，張議潮在咸通二年（861）至咸通八年（867）間稱司空，而繼任節度使張淮深在咸通年間最高的檢校官為尚書。參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第二章。P.3281v 錄文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75頁；圖版參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5頁。

<sup>16</sup>S.4622V 圖版參見《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6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69頁。

<sup>17</sup>此事有敦煌文獻S.6341號《張議潮處置涼州進表并批答》為證，錄文參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363頁。

<sup>18</sup>見李軍《晚唐（公元861—907）涼州相關問題考察》，77-90頁。

<sup>19</sup>馮培紅《敦煌歸義軍職官制度——唐五代藩鎮官制個案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蘭州大學歷史系，2004年，219頁。

<sup>20</sup>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80-81頁。張淮深德政碑，即綴合S.6161 + S.3329 + S.11564 + S.6973 + P.2762 五件寫本而得的《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淮深）德政之碑》。

淮深墓誌也記張淮深在張議潮入朝後曾“再建節旌”即再次被唐朝冊封為歸義軍節度使一事，均與敦煌文書中保存的張淮深求節、受節文書所記史事互相矛盾。根據這一矛盾可以得知，張淮深在文德元年前的節度稱呼並未得到朝廷的冊封任命，而只是他自己在歸義軍轄境內的自稱。另外，在文德以前朝廷給張淮深的加官，往往都比張淮深在境內的自稱要低，而賜官使命的到來，又是他自封更高官稱的契機。這些都是張淮深時期不完全服從唐朝政府號令的具體體現。而唐廷對張淮深也並不信任。一方面，唐朝政府想要利用已經束身歸闕的張議潮遙領歸義軍而不可得，張淮深已經掌握了歸義軍很大的領導實權；另一方面，因為歸義軍內部支持張淮深派系與反對張淮深派系的矛盾，歸義軍勢力減弱，甘州、涼州等地漸漸出現動盪，虛張聲勢、自稱節度的張淮深迫切的希望得到朝廷的正式冊封。張淮深屢屢派出求節使者、甚至緊跟僖宗逃難的羣步到達興元駕前求節，但唐朝政府仍然百般場延。對此情景，有 S.1156《沙州進奏院狀》可證，為更加具體的說明歸義軍中支持淮深持節方、反對淮深持節方以及對是否冊封節度有決定權的唐政府方等各方面態度，在此引 S.1156 狀內容全文如下：

進奏院 狀上：

當道三般專使所論旌節次第逐件俱錄如後：

右伏自光啟三年二月十七日，專使押衙宋閏盈、高再盛、張文徹等三般同到興元駕前。十八日，使進奉。十九日，對。廿日，參見四宰相、兩軍容及長官，兼送狀啟信物。其日面見軍容、長官、宰相之時，張文徹、高再盛、史文信、宋閏盈、李伯盈同行。定，宋閏盈出班，社對叩擊，具說本使一門，拓邊效順，訓襲（習）義兵，朝朝戰敵，為國輸忠，請准舊例建節，廿餘年，朝廷不以（與）指搆，今因遣閏盈等三般六十餘人論節來者。如此件不獲，絕商量，即恐邊塞難安，專使實無歸路。軍容、宰相處分：“緣駕回日近，專使但先發於鳳翔社候，待鑾駕到，即與指搆者。”至廿二日，夷則以（與）專使同行發來。三月一日，卻到鳳翔。四日，駕入。五日，遇寒食。至八日假開，遣參宰相、長官、軍容。九日，便遣李伯盈修狀四紙，同入中書，見宰相論節。其日，宋閏盈懇苦再三，說道理。卻到驛內，其張文徹、王忠忠、範欺忠、段意意等四人言：“路次危險，不用論節，且領取回詔，隨韓相公兵馬相逐歸去，平善得達沙洲（州），豈不是好事者！”其宋閏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不肯，言：“此時不為本使懇苦，論節將去，虛破僕射心力，修文寫表，萬遍差人，涉歷沙磧，終是不了。”至十一日，又遣李伯盈修狀四紙，經宰相過。至十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狀七紙，經四相公、兩軍容及長官過，兼宋閏盈口說道理。言：“留狀商量。”中間三日，不過文狀。至十七日，又遣李伯盈修狀五紙，經四宰相過，及見長官，亦留狀，不蒙處分。中間又兩日停，至廿日，又遣李伯盈修狀七紙，

經四宰相、兩軍容及長官過，亦宋閻盈說道理。亦言：“留狀。”見數日不得指搗，其張文徹、王忠忠、範欺忠、段意意等便高聲唱快。又言：“趁韓相公兵馬去者。”便招召三行官健，遣一齊亂語，稱：“不發待甚者？”宋閻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言：“頗耐磳人！我不得旌節，死亦不去。”夷則見他三行言語紛紜，拋卻遂出驛來，又遣李伯盈修狀五紙，見四宰相及長官，苦著言語，痛說理（利）害，言：“此件不賜旌節，三般專使誓不歸還者。”其宰相、長官依稀似許。其宋閻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遂遣夷則、通徹求囑得堂頭要人，一切口稱以作主，檢例成持與節及官告者。遂將人事數目立一文書呈過，兼設言約。其日商量人事之時，三行軍將官健一人不少，總言相隨論節，只有張文徹、王忠忠、範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不肯，言：“終不相隨。”其張文徹就驛共宋閻盈相諍。其四人言：“僕射有甚功勞，覓他旌節。二十年已前，多少樓羅人來，論節不得，如今信這兩個慙屢生，恠沸萬劫，不到家鄉，從他宋閻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詐祖幹聖，在後論節，我則親自下卦，看卜解聖，也不得旌節。待你得節，我四人以頭倒行。”夷則見張文徹等四人非常惡口穢言，苦道不要論節。亦勸諫宋閻盈、李伯盈等榮則同榮，辱則同辱，一般沙州受職，其張文徹、王忠忠、範欺忠、段意意等四人，上自不怕僕射，不肯論節，一齊拋卻發去，有何不得？其宋閻盈、高再盛、史文信、李伯盈等四人以死不肯，言：“身死閒事，九族何孤！節度使威嚴不怕，爭得我四人如不得節者，死亦不歸者。”夷則見他四人言語苦切，同見堂頭要人，子細商量，言：“不用疑惑，但頻過狀，我與成持。”至廿三日，又遣李伯盈修狀四紙，經宰相（下缺）<sup>21</sup>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歸義軍內部矛盾已趨公開化、白熱化，而唐朝政府卻仍然遲遲不予處理，場延著不賜張淮深節度旌節<sup>22</sup>。如同上面引文中所提及，“二十年已前，多少樓羅人來，論節不得”，張淮深二十餘年求節不得，可知對唐朝政府的怨忿之心；而唐政府遲遲不賜旌節，也明顯表示出對張淮深的不信任之意。所以可知，在《秦婦吟》問世伊始，即張淮深統治的後期，雖然張淮深自中和四年開始先後派出三批專使入京求節，唐廷也最終在文德元年派遣押節大夫宋光廷等前往沙州賜節，雙方交通往來不斷，但是其本質關係還是貌合神離、互相猜忌防範。

### 3、對雙方影響的分析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開始的問題，為何已經在中原被“公卿頗多垂訝”、作者“撰家戒”禁之的作品，在敦煌卻迅速受到歡迎與脛及瘡？筆者以為，至少有這樣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敦煌民緣對中原有尚未泯滅的歸屬感，這可以從張議潮起義時所領導的隊伍、所宣導的口號以及民心所向得到確認。當惦念依戀的中原遭

<sup>21</sup>此處錄文據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187-189頁。

<sup>22</sup>事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186-187頁。

遇如此慘禍之時，敦煌民衆存有希望瞭解此事的願望，而描寫細膩、中原四處流傳、被懸為緝子、又是已經位至唐廷補闕的韋莊所書寫的《秦婦吟》，對整個長安陷落的詳實情況無疑是非常可信的。加之或許因為抗擊吐蕃的原因，敦煌學校中對記錄戰爭的文獻並不避諱、屢有教授，如描寫慘烈陰森場面之白起坑趙卒事件的《秦將賦》也在學子抄寫之列，還有《季布罵陣文》、《漢將王陵變》等等文獻。另一方面，在民間自發的主觀選擇影響之外，曾影響《秦婦吟》在中原地區傳播興衰的政治因素，在敦煌也依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卻是相反的作用。針對涼州的爭奪事件，特別是張淮深反復遣使求授旌節而唐朝就是不給，充分表露出歸義軍與唐廷之間的矛盾關係。也正是在唐中央政府與敦煌歸義軍政權這樣貌合神離、一直存有矛盾的情形之下，被中原士大夫公卿貴族們“多所垂訝”，讓一些宦官或藩鎮節帥感覺頗不愉快的《秦婦吟》，在敦煌卻因為敦煌統治者們不以為然的態度而受到了極大的歡迎。《秦婦吟》所詈罵的公卿也好、將領也好、甚至是被認為是唐僖宗化身的金天神也好，在敦煌歸義軍這裡完全沒有任何避諱，歸義軍政權的統治者自然也不會因此而不喜歡《秦婦吟》。因此可以說，沙州的政治環境為《秦婦吟》提供了一個相對廣闊的傳播空間。在沒有遇到任何傳播阻力的情況下，《秦婦吟》得以依靠其自身的藝術魅力，暢通無阻的流布於敦煌的坊里寺院之間，甚至在敦煌學校中登堂入室、成為學子們隨身攜帶的功課和日常學習使用的教材，傳誦於婦孺老幼之口，流布於村坊里巷之間，風行一時。

## 二、傳播的交通條件 沙州與中原間的來往路線

要討論《秦婦吟》從中原到敦煌之間的傳播，則不能不先交代此兩地之間的交往與交通情況。而要梳理其交往和交通情況，很有必要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段。上面已經分析過《秦婦吟》問世後直到韋莊去世之前這段時間是《秦婦吟》傳播興衰的最重要時期，在此即以此時間段為中心，對中原與敦煌之間的交往與交通，以及這樣的交往與交通對《秦婦吟》流傳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分析與解說。

### （一）交往人群

《秦婦吟》自中原傳入敦煌的方式，不外乎民間和官方兩種。鑒於《秦婦吟》中有反映唐廷無能而失守長安、戰亂使得人民凋敝的唐廷毫無顏面，以至於公卿訝之、韋莊禁之等情況，可知在中原地區，此詩曾不為統治者所樂見，不具備借助唐廷政府進行傳播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唐廷與沙州歸義軍政權之間多有使者往來，而且民間對《秦婦吟》多所鍾愛，中原地區不少家庭將其制為緝子懸掛於室，敦煌地區



多有學生制為冊子隨身攜帶學習誦讀，故可以推測《秦婦吟》主要應該是私人傳播。而私人的傳播又可以包括由僧侶、媮通民緣、公職官吏傳播等多種形式。因為材料有限，《秦婦吟》是作為商品、還是作為文人之間的授受禮品、亦或作為口頭談資而傳入敦煌等種種情況目前並不可知。因為史料記載的缺乏，《秦婦吟》經由媮通民緣傳入敦煌的詳細情形也並不可考。可以作為考察線索的，是因為公職出使等緣故而來往於敦煌和中原之間的部分文人官吏們，或者是隨行出使的書記、典吏等僚佐，由於他們中間不少人既有足夠的文化水準，又能對《秦婦吟》所描寫的百姓疾苦深有感觸，而且在出使過程中會接觸各地各色人等<sup>23</sup>，從而也很有可能將此長安等中原地區流行的詩文帶至敦煌，傳於其他知識份子，進而流播於敦煌坊巷的僧俗之間。

從《秦婦吟》問世後的 883 年到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敦煌最早的《秦婦吟》抄本學仕郎張龜 905 年抄本的出現，往返於敦煌與長安之間的使者可以說絡繹不絕。

在 21 年之中，雙方官方派遣使節的往來至少達 13 次以上，大致一年多就有一次來往被記錄下來<sup>24</sup>。由此可以推知，當時的中原地區和敦煌邊塞之間的交通，相較於原本的路途遙遠、山重水復的困難，並未因為戰亂而完全阻斷，雙方斷斷續續的保持著來往聯繫。在受到回鶻阻礙的時期，雖然有極大的困難，但是歸義軍也努力爭取與中原地區通好、入奏。所以基本上可以說沒有長期隔絕、嚴重阻斷的情況。如果考慮到傳世材料的不完全性，想來平均每年一次的遣使是有可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的流行文化傳播可以說受到阻礙而發生的滯後性或許並不是那麼嚴重。就《秦婦吟》來說，韋莊約在 883 年寫成，在韋莊寫成並進奉給周寶之後，不脛而走，隨即風靡一時，韋莊得以有“《秦婦吟》秀才”之美譽。雖然或許於 884 年從中原回歸敦煌的一行人中還沒有人來得及有機會接觸到《秦婦吟》，但是上舉 885—901 年間那些來自中原的使者，都有可能帶來當時已經在中原風靡而起的長篇詩歌《秦婦吟》。據學子題記年代之接近創作時間可知，當《秦婦吟》傳入敦煌後迅速為敦煌民緣所接受。由於《秦婦吟》在成為教材之前必然為知識份子階層所接受，而且一定要風評良好，才會為教授學童知識的先生所接受而作為教材，所以可知，雖然《秦婦吟》至遲在 905 年已成為教材，但在此之前，必已流行於敦煌。

<sup>23</sup>如杏雨書屋所藏羽 32 號寫本《驛程記》，有沙州歸義軍使者次第經行多處驛館等各地區的通行、住宿、交往之類的活動記錄（參高田時雄《李盛鐸舊藏 驛程記 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 5 號，2011 年，1-13 頁），在類似於這樣的出使隊伍中，必然有使臣、書記、僕役等各色人等，也很可能有欣賞《秦婦吟》詩作的人存在，所以筆者認為，雖然基本上不會有借助唐廷政府下賜地方進行傳播的可能性，但是經由官方使者私人攜帶並傳播至敦煌的可能性卻很高。

<sup>24</sup>相關交往記錄均見下述著作中的年表：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9-14 頁；榮新江、余欣《沙州歸義軍繫年（咸通十四年—中和四年）》，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敦煌學》第 27 輯，臺北樂學書局，2008 年，255-273 頁；又《沙州歸義軍史繫年（中和五年—龍紀元年）》，鄭炳林主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2008 年度理事會議論“敦煌漢藏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11 年，100-110 頁。

## （二）交通道路

《秦婦吟》的流傳於敦煌，很有可能是借助前文所提及的雙方使節的往返兩地。因為兩地的地理位置以及當時的交通條件所限，雖然敦煌本身通向四方的交通也是四通八達，但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以及政治動盪背景的影響下，並非所有的路徑都能時時保持暢通<sup>25</sup>。為了進一步瞭解《秦婦吟》在傳入敦煌時可能經行的路線與方式，在此對當時中原與敦煌之間的交通略作交代。

中原與敦煌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一般來說，主要是經過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東段與吐谷渾道。長安、洛陽經敦煌西通西域各國的所謂絲綢之路東段又主要有三條路線，即，北線：長安（或洛陽） 涇川 固原（或隴西） 靖遠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路線最短，但沿途缺水。中線：長安（或洛陽） 涇川 平涼 會寧 蘭州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距離與補給適中。南線：長安（或洛陽） 鳳翔 天水 隴西 臨夏 樂都 西寧 張掖 酒泉 敦煌，路途漫長。

以上三線均為長安或者洛陽出發，到武威、張掖匯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但是因為戰亂或其他原因，以上路線並不能夠保證時時通暢，所以往來人員也會另辟他途，經行一些稍有變動的路線。比如，在南北朝時代，由於南北方統治政權的對立，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在與西域進行交往之時，基本上是沿著長江向上，經過益州（今成都），再北上到龍涸（今松潘），經過青海湖畔的吐谷渾後，再繼續向西經過柴達木盆地，最終到達西域東部的若羌；如果從今格爾木向北翻越當金山口，就可以到達敦煌。這條路線即“吐谷渾道”，或稱“河南道”、“青海道”<sup>26</sup>。在商業領域獨樹一幟的粟特人，由於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的分裂動盪，在進入南方時也大多是利用西域與南朝的聯繫的通道——由西域經吐谷渾控制的青海地區，經松潘南下益都，再順長江而下<sup>27</sup>。

當隋唐時期益州經濟發達，成為“揚一益二”的大都市之後，途徑益州之途愈顯魅力。在河西走廊不時為吐蕃、回鶻等部族侵擾、佔領時期，歸義軍與唐廷之間的來往就更不得不繞行其他地區，再達敦煌。而北宋時期因為西夏的從中阻斷，也從十世紀開始，有經行天水、青海而西去者。

綜觀交通情況以及歷史背景，唐末五代之時，雖然戰亂頻仍，交通道路多有變

<sup>25</sup>相關史地論著較多，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見青山定雄《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63年；前田正名《河西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吉川弘文館，1964年；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等等。關於敦煌的四出道路，可以參考陳國燦《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後收入氏著《陳國燦吐魯番敦煌出土文獻史事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61-582頁。

<sup>26</sup>對此道路的詳細考證，參看陳良偉《絲綢之路河南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sup>27</sup>榮新江《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韓昇編《古代中國：社會轉型與多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38 - 152頁；收入作者《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三聯書店，2014年，42-63頁。

遷，但是由於沙漠等自然環境的惡劣，不得不儘量追逐水草尋覓路徑，所以最終也大多是沿著秦漢舊道而行。而同時，僖宗自長安西播巴蜀，韋莊也曾出使巴蜀，所以《秦婦吟》必然也有自長安、自江南西轉巴蜀腹地、再傳入敦煌的可能性。而實際上，筆者認為，《秦婦吟》傳入敦煌的路線當以南經巴蜀與北繞河西東部的可能性最高。

且不說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出自四川的造像與中亞、西亞的不少入蜀胡商關係密切<sup>28</sup>，僅僅是益州成都作為唐代玄宗、僖宗的避難之地，史料記載不厭其詳，其與長安之間存在頻繁的交通往來一事不言而喻。即不厭其詳。不論是現存的廣元摩崖造像、巴中摩崖造像等石刻題記資料<sup>29</sup>，還是史籍記載的金牛道、米倉道等交通交往的情況<sup>30</sup>，都說明其與長安之間存在着頻繁的交通往來。實際上，益州與敦煌往來交流的相關史料也極為豐富，我們不妨把前人提示的相關敦煌文獻羅列如下，並補充一二新材料。

(1) 在敦煌寫本中，保存有中原失傳的成都淨緣派禪僧所撰燈史《歷代法寶記》。此書大約編成於唐大曆九年(774)六月保唐寺僧無住寂沒以後不久，最晚不遲於大曆十四年(779)。敦煌保存有抄本十餘件<sup>31</sup>，張廣達先生由此認為，“保唐派之文獻如《歷代法寶記》等大量見於敦煌，益可令人確信西蜀與敦煌早自8世紀中期已有非常密切的往來”<sup>32</sup>，其傳入的路線很可能是成都到敦煌。

(2) 英藏敦煌發現的刻本《中和二年(882)具注曆日》(S.P.10)，是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印製的，也是從成都傳到沙州的民間曆書<sup>33</sup>。

(3) 天祐二年(905)三月已後，沙州有位八十二老人，抄寫了多件《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據底本，均係來自西川過家的印真本。(S.5534、S.5444等)<sup>34</sup>

<sup>28</sup>參見吳礎《四川早期佛教文物及其年代與傳播途徑考察》，《文物》1992年11期，40-50頁；以及宿白《四川省錢樹和長江中下游部分器物的佛像——中國南方發現的早期佛教札記》，《文物》2004年10期，61-71頁。

<sup>29</sup>見《廣元石窟內容總錄·皇澤寺卷》，巴蜀書社，2008年；《廣元石窟內容總錄·千佛崖卷》，巴蜀書社，2014年；《巴中石窟內容總錄》，巴蜀書社，2006年。例如，巴中南龕摩崖第016龕(中唐)外龕左壁有“咸通”字樣、右壁有“涼商童此年裝彩”字樣(《巴中石窟內容總錄》，32頁)；第083龕則出現了流行於河西、新疆一帶的一身雙頭佛像(彩圖見《巴中石窟內容總錄》，39頁)，等等。

<sup>30</sup>嚴耕望曾對金牛道做過詳細論說，見氏著《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863-906頁。

<sup>31</sup>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1卷，1928年；柳田聖山《禪の語錄》III《初期の禪史》II，築摩書房，1976年；榮新江《敦煌本禪宗燈史殘卷拾遺》，白化文編《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中華書局，1997年，235-242頁；《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彩版，津藝103號；榮新江《有關敦煌本《歷代法寶記》的新資料——積翠軒文庫舊藏“略出本”校錄》，《戒幢佛學》2(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專輯)，嶽麓書社，2002年，94-105頁。

<sup>32</sup>張廣達《唐代禪宗的傳入吐蕃及有關的敦煌文書》，原載《學林漫錄》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此據作者《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242-266頁。

<sup>33</sup>S.P.10，圖版見《英藏敦煌文獻》第14卷，249頁。

<sup>34</sup>S.5534，圖版見《敦煌寶藏》，265-272頁；S.5444，圖版見《敦煌寶藏》，548-562頁。舒學(白化文)《敦煌漢文遺書中雕版印刷資料綜述》，《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1988年，296頁。

(4) 天復八年(908)四月,敦煌布衣翟奉達曾依西川印本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P.2094B)<sup>35</sup>

(5)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諸經摘抄》,題武成三年(910)六月八日沙門慧覺書<sup>36</sup>。武成為前蜀王建的年號,這件寫於蜀地的佛典應當是歸義軍時期從蜀國傳到敦煌的。

(6) 據考創作於開平四年(910)八月前後的《白雀歌》(P.2594 + P.2864)有云:“樓成白壁聳儀形,蜀地求才贊聖明。自從湯(唐)帝升霞(遐)後,白雀無因宿帝庭。”<sup>37</sup>這首詩意在頌揚白衣金山漢國天子向蜀地招攬賢良的聖明英武,證明了四川與敦煌之間交流關係的密切。

(7) P.2292《維摩詰經講經文》有題記云:“廣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廿卷文書,恰遇抵墨書了,不知如何得到鄉地去。”這裡的“廣政”,是後蜀後主孟昶的年號,廣政十年為五代晉天福十二年(947),所以,此發現於敦煌的經卷無疑是寫於後蜀西川的靜真禪院,然後被攜帶流傳至敦煌的<sup>38</sup>。

(8) 國圖冬62號(縮微膠捲北1192號,新編BD02062號)《維摩經》卷中抄本背題記云:“大周廣順捌年歲次七月十一日,西川善興大寺西院法主大師法宗,往於西天取經,流為郡主太傅。”<sup>39</sup>951年郭威滅漢自立為帝,建號大周,改元廣順。大周廣順八年(958)即後蜀孟昶廣政二十一年。所以這是在十世紀下半葉來自後蜀的高僧經過敦煌前往印度取經事蹟的記載,此記載證明了巴蜀與敦煌之間往來交通道路的通暢,以及兩地之間交流的便利<sup>40</sup>。

此外,饒宗頤曾在《敦煌白畫》中考證了益州的畫風與敦煌畫風的相似性與關聯性,從繪畫的領域進一步證實了益州與敦煌之間密切的交流關係<sup>41</sup>。

由上可見,除了佛教文化的交流之外,巴蜀與敦煌之間其他各種書籍、民間曆書、物品的交流也極為發達,在這條絲綢之路上,不僅物質財富交流豐富,甚至人員流動、人才交流也絲毫不能忽視<sup>42</sup>。益州與敦煌之間發達的交通有利於反向促進經濟

<sup>35</sup> 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50頁。

<sup>36</sup>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 No.2150, 453-454頁。

<sup>37</sup> 王重民《金山國墜事零拾》,原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卷第6號,1935年;此據《敦煌遺書論文集》,85-115頁。

<sup>38</sup> 向達《唐代刊書考》,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三聯書店,1957年,132頁。

<sup>39</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2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386頁。

<sup>40</sup> 陳祚龍《中世敦煌與成都之間的交通路線》,《敦煌學》第1輯,1974年,79-86頁;龍晦《敦煌與五代兩蜀文化》,《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96-102頁;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李錚、蔣忠新主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9-960頁。

<sup>41</sup> 饒宗頤《敦煌白畫》,巴黎,1978年,第26-28頁。

<sup>42</sup> 最近發表的馮培紅關於西北與東南交往的研究,極有見地。見所撰《敦煌吐魯番文獻所見中古時代西北與東南的交往》,武漢大學中國三到九世紀研究所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唐長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專輯》第27輯,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編輯部,2011年,503-527頁。

文化的傳播與交流，當 901 年韋莊受命出使巴蜀之時，或巴蜀已有知曉“秦婦吟秀才”者，所以可知，《秦婦吟》經巴蜀轉而傳入敦煌也是很有可能的。我們從上面列舉的今天所見敦煌材料來看，《秦婦吟》在敦煌出現的 905 年前後，也是巴楚地區流入敦煌佛典、藝文作品最多的時期，這恐怕不是偶然的。

與益州到敦煌路線研究的深入相應，也有多位學者討論和涉及到自長安經靈武進入敦煌的交通情況。本來以河西走廊為通西域最常用的交通路徑，但是在唐末，因吐蕃的侵佔、胡族的崛起等因素涼州等地區時有紛擾戰亂，經常交通不暢，因此靈州自玄宗、肅宗時期逐漸開始擁有重要地位，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交通要塞。

根據趙貞《歸義軍史事考論》中專門對靈州道的研究可知，北方遊牧民族先是開闢了自漠北額濟納河南下橫斷河西的路線，此後該路線經久不衰。到隋唐時，由於甘、涼、靈三州之間的聯繫和交通，於是遊牧民族南下入侵的路線具體體現為靈州西通甘州、靈州西通涼州的道路，靈州道由此產生。而此路的徹底開通，則還要歸功於張議潮起義。九世紀初，因為吐蕃對鹽州、夏州、靈州的佔領，擔負唐王朝中西交通使命的是繞道回鶻衙帳的路線。而九世紀四十年代，回鶻敗於黠嘎斯（840），後西遷磧西及河隴一帶，回鶻路漸趨磅寂。而稍後，吐蕃亦因敗於畚州刺史尚婢婢而實力大損（846），彼時，靈州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軍事優勢而備受矚目。而張議潮 848 年驅逐吐蕃起義的成功最終成全了此條路線的開通<sup>43</sup>。

開通後的靈州道，在中原和西域之間的交通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據《歸義軍史研究》可以舉若干事例如下：

（1）光啟元年（885），十二月，靈州安慰使嗣大夫至沙州，節度參謀張大慶因而抄得《沙州伊州地志》一卷。（S.367）

（2）光啟四年（888）二月十日，唐改元文德。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十月，唐朝派遣中使宋光廷為正使、朔方押衙康元誠為副使，往沙州授予張淮深歸義軍節度使旌節。（有鄰館藏文書）

（3）光化二年（899）十月，北地使者梁景儒至沙州，沙州遣使入奏朔方。（P.4640V）

（4）光化四年（901）三月，唐朝使臣至沙州，頒賜詔命，朔方麻大夫同至。押衙王保安出使甘州。（P.4640V，S.4359V）四月二十五日，唐改元天復。

如此這般的史料記載與文書資料頗多，足以證明中原與敦煌之間的交流緊密，且靈州道在唐代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sup>44</sup>，是極為重要的通行途徑，不論官吏、僧人還是商客，都可能將《秦婦吟》攜帶傳播入敦煌，所以河西東部的靈州道也是《秦婦吟》傳入敦煌極有可能經過的路線之一。

<sup>43</sup> 趙貞《歸義軍史事考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四、第五章。

<sup>44</sup> 李鴻賓《唐朝朔方軍治所靈州道凸顯的戰略地位以及變化》，《唐朝的北方邊地與民族》，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128-143頁。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在杏雨書屋所藏敦煌文獻中所發現的涉及敦煌至中原的路程記載資料《驛程記》。這份資料不僅能夠提示唐朝後半期的陰山與天德軍情況<sup>45</sup>，更是以猶如今天日記一般的形式，直接簡要而準確的逐日列舉出了歸義軍使者一行人所經歷的地點和經行至該地的日期。因為文獻的首尾殘缺，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西起西受降城、東至雁門關的一段行程。但是，據京都大學高田時雄教授的考證推測，這份文獻應該是沙州歸義軍政權派往中原的正式使節團的記錄。他們自敦煌出發，大約從肅州一帶沿額濟納河北行，到達居延，再向東改道穿過戈壁，到達西受降城。之後如《驛程記》所記載，一路前行，到達雁門關。這期間，因為他們是因公前往朝廷所在地的正式使節，所以在天德軍處停留十日，並享受到了當地組織打毬這類的最高級別的接待活動<sup>46</sup>。這份資料提示我們，此路在歸義軍時期是暢通的，而且有大型公使團隊的經過，從而證明了《秦婦吟》經由此途傳入敦煌的可能。

## 結語

從上文《秦婦吟》的流傳背景以及流傳途徑的分析來看，唐末社會文化的傳播速度非常之快。緣所周知，《秦婦吟》寫本發現於敦煌藏經洞，而且目前我們已經發現了十一件寫本<sup>47</sup>，根據《秦婦吟》本身內容的記載，以及目前所掌握的韋莊生平事蹟來看，《秦婦吟》創作於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韋莊逃出長安後經洛陽轉往江南之際。又，韋莊一生中不曾去過敦煌，所以《秦婦吟》應當是由來往於中原、敦煌之間的某些人傳播入敦煌，而且在敦煌受到了人們的關注，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才会有學仕郎等各色人等的抄寫。從敦煌文獻中發現的《秦婦吟》金光明寺學仕郎張龜寫本末尾的題記可知，《秦婦吟》傳入敦煌的時間不晚於唐天復五年（905）<sup>48</sup>。由於史載韋莊是前蜀武成三年（910）宰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任上卒於花林坊<sup>49</sup>，故而可知，韋莊在世時《秦婦吟》即已傳入敦煌，並在敦煌的學校之中成為學仕郎們學習的教材。就在韋莊生前極力“諱之”、“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緋子”、不選《秦婦吟》入《浣花集》之時<sup>50</sup>，《秦婦吟》已然在敦煌紮根，深入到了寺院、私塾等學校教育體系，被學郎們手寫口誦，甚至製成小冊子隨身攜帶學習。可見，即使剛經歷過兵荒

<sup>45</sup>齊藤茂雄《唐後半期における陰山と天德軍 敦煌發現“驛程記斷簡”(羽032)文書の検討を通じて》，《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47號，2014年，71-99頁。

<sup>46</sup>見高田時雄《李盛鐸舊藏 驛程記 初探》，前注22。

<sup>47</sup>11件寫本之詳情可參考拙文《秦婦吟 敦煌寫本新探：文本概觀與分析》，《敦煌研究》待刊。

<sup>48</sup>此時韋莊已仕於王建，身份日漸尊貴，或已有自禁之舉，未為可知。

<sup>49</sup>[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〇前蜀六，中華書局，1983年，593頁。

<sup>50</sup>據韋莊之弟韋靄書於《浣花集》前之序言可知，該集編撰於癸亥年，即西元903年。見韋諷《浣花集·序》，向迪琮校訂《韋莊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101頁；又見韋莊著、聶安福校注《韋莊集箋注》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83頁。

馬亂、生靈塗炭，中原地區政治動亂嚴重，遠程交通在路途險阻之外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安全因素，但在中原隨即流行一時的《秦婦吟》，仍然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傳播至遙遠的西北邊疆，還成為學童們的學習教材而廣為流布傳承。由此可見當時中原與敦煌之間交往的密切，以及隋唐長安社會上流行文化的影響力之巨大。在中原由於“公卿垂訝”而被禁的《秦婦吟》，因為敦煌統治者與中原統治者之間微妙的面和心不合的關係，在敦煌得到了更多的傳播機會，甚至深入學校、坊間，廣為流布。

如今的典籍文獻研究已經不單純是靜態的、個體的研究，而是將一系列個體一一放到社會大環境下的各個對應位置所進行的動態、立體的研究。《秦婦吟》可以說是唐長安文化快速西傳並影響敦煌文化氛圍的一個有力佐證<sup>51</sup>，本著“以小見大”的原則，筆者在本文中選取《秦婦吟》為研究對象，通過《秦婦吟》這樣一個具體的文本傳播實例，同時借助其他敦煌同類寫卷文獻的傳播為佐證，考察了典籍文獻在當時問世、流傳等過程中的條件和途徑，探討了長安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傳，對探索唐末紛亂的時代大背景下文本傳播方式、實態做出了嘗試。

敦煌文獻的問世，使得我們對敦煌文化與長安文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多的瞭解。從文化的空間傳播和時間傳承上來看，敦煌文化的果實中包含著大量長安文化的養分，甚至可以說，中世時期的敦煌文化就是敦煌地區對長安文化學習、效仿並再創造的結果。敦煌文獻在地理上位於邊陲的沙漠綠洲之中，在源頭上是唐長安文化傳播四方的碩果之一。寫本作為文化載體的一種物質表現形式，有著其獨特的時代特色和歷史氣息。究明敦煌寫本文獻的因果流變，探索其傳播方式以及傳播路徑等相關問題，從而進一步探討中國中世唐代寫本文獻在整體上的對外傳播狀況，無疑對中國中世社會文化傳播情況的瞭解會起到有宜的作用。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sup>51</sup>長安文獻的外傳速度可以說是十分迅速的，不僅西傳敦煌如此，東傳日本也是如此。據日本文德天皇實錄記載，早在日本承和五年（838），太宰少貳藤原岳守就曾向仁明天皇（833—849年在位）呈獻過唐商人舶來品之一的《元白詩筆》（事見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新訂增補版），吉川弘文館，1974年，31頁），而此時白居易（772—846）是健在的。《白氏文集》尚有白居易自記題詞，云：“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見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華書局，2011年，2039頁）由此可知，白氏本人也知道自己的文集在日本、新羅諸國有所流傳。相關問題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此不贅述。